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 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

高 帆

内容提要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于经济发展时代特征提出的新经济概念。本文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提出逻辑、理论内涵和多维意义，强调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导源于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绩效以及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导源于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及其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以及保障等维度的含义，进而对“新质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进行了内涵比较。立足于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阐述，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这一概念提出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意义，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在实践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理论中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 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6）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自人猿揖别之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始终面临这样的重大问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在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中满足自身需要？由此出发，人们在利用、改造甚至保护自然中表现出的能力——生产力——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作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规律性认识，经济学自然也将生产力作为研究的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被视为理解社会形态变迁的逻辑主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探究经济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的形成与演变规律，但这种探究是与生产力这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密不可分的，是在联系生产力及其变动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强调：“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① 作为在社会变迁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生产力本身受到要素禀赋、要素组合的影响，也受到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生产力状况往往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从空间角度看，在特定时期，不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通常存在着显著落差；从时序角度看，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其在不同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也很不相同。这种差异特征意味着，在理解生产力这个重要经济学范畴时采用历史的、动态的思维极为必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始终是全球范围内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我国而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关键环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由此体现出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重大主题的回应。从实践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快速、广泛、显著的发展，无论是从我国发展史还是从全球发展史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在生产力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都堪称“奇迹”。中国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据极小份额的国家成长为仅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

于美国的GDP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具有数以亿计农村贫困人口的国家转变为农村绝对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国家，这些都是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迅猛发展的具体例证。伟大的经济实践已使中国生产力水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这种格局，在物质基础等领域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生产力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不断深化对生产力概念及其发展方式的规律性认识。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这是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基础、时代特征和目标任务，针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的重大命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取向。“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范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我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担负的新使命。由此延伸开来，在理论层面，人们需要回答：作为一个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特征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为何需要且为何能够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概念？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究竟是指什么？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对于中国发展实践以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而言，“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提出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文试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演变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指引实践发展的逻辑下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含义和意义，以体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边际贡献。

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逻辑

经济学概念是构成经济理论的“基本元素”，其本质上是人们对经济现象的提炼概括，以此为把握实践发展规律这种需要提供条件。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也是经济实践推动和回应发展需求的结果。从“供给”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生产力发展实践和认识维度均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从“需求”角度看，当前我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的历史交汇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对生产力持续发展具有内在需要，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转变以及科技产业变革则引致了生产力形成源泉、表现形态的变化。上述“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使得我国具备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从“供给”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本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史。在不同时期，立足于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战略而形成一系列经济制度，由此对生产力发展提供驱动力量，并随着条件和战略的转变，对经济制度进行必要的动态调整，以使生产力发展保持平稳快速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采取的基本方式、得出的主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立足于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客观现实，在农村实施了以“耕者有其田”为指向的土地改革，这一经济制度变革的结果是：1949—1953年我国3亿多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这对农村居民产生了极为显著的经济激励，农村生产力也因此得到了快速解放和发展，这为我国在短时期内恢复国民经济秩序提供了根本保障。1956年我国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经济发展战略开始转向重工业优先发展，在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人民公社制、城乡户籍制度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我国在初始条件极度不利的情形下达成了战略目标，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后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但计划经济体制却内生着资源配置低效率，其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开启了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对外的融入全球经济——从2001年“入世”前的局部开放到此后的全面开放，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农户、城市企业以及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市场、竞争、供求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也更突出地发挥出来，其结果是生产力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快速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1978—2022年中国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12%和8.14%，远超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3.00%和1.56%）。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78—2022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比重从1.47%增至18.19%，相当于美国GDP的比重从5.30%增至77.91%。1978—2022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全球人均GDP的比重从6.57%增至102.42%，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比重从1.23%增至18.39%。2010年中

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22 年中国 GDP 分别相当于欧盟、日本、印度的 107.31%、362.09%、552.46%。2019 年之后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2021 年和 2022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已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门槛线”。^① 这些表明，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当前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特征事实。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使得“落后的社会生产”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历程看，我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已取得了极为显著的绩效，这在全球发展史上是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重大事件。

从时序角度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站上新起点，而且意味着我国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思想层面不断提炼和总结生产力发展经验，并逐步形成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系统理解。具体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功能论，即将社会主义功能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具体应用，即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制度调整来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力发展以及发展成果共享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二是生产力发展的基准论，即将生产力发展作为评价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标准，从“生产力视角”来检验各项工作的推进成效。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个有利于”中居于首要位置，生产力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这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在我国建设、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居于基础性位置，具有关键性作用。三是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国不仅明确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而且积极探索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特别是，科学

^①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计算整理所得。

技术在组合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方面具有枢纽作用，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约束明显的国家，我国发展生产力必须在有形要素供给之外寻找动力源泉。由此出发，邓小平同志在 1988 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意味着我国对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方式和手段有深刻明确的认识。四是生产力发展的保障论，即生产力发展不是自然发生的，它必须以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调整完善作为驱动力量。经济制度的调整完善即在于通过规则完善来形成稳定预期，激发市场活力，产生激励效应。1978 年之后，我国即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来形成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清晰地表明，我国在生产力发展中，不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侧重通过生产关系层面的调整或经济制度变革来形成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五是生产力发展的变迁论，即深刻把握生产力的历史性、动态性特征，依据不同时期的客观条件和目标定位，推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式和形态等方面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经过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生产力水平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从更好满足城乡居民需求的角度出发，我国立足于新的战略目标理解和部署生产力发展。2012 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则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主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生产力发展的背景、目标、重点、方式等均在发生转变，我国是在动态演化视角下来认识生产力发展问题的。总之，伴随着社会实践变动，我国针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不断深化，功能论、基准论、实现论、保障论、变迁论等意味着我国针对生产力发展形成了系统深入理解，在生产力发展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并形成规律认识，把握和利用这些规律也是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的重要原因。

从“需求”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导源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在多个维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为生产力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新课题，从回应挑战的角度看，我国在生产力发展的指向和方式上需要采用新思路、新举措。新征程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集中体现为两个“十五年”：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目标的达成以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前提，例如，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包含着明确的经济目

标——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等，这些都要求GDP、人均GDP增速不能出现大幅度回落，需保持在相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世界水平更高的位置。与这种客观需要相对应，现阶段我国驱动生产力发展的若干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例如，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最终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迄今为止全球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缓慢增长阶段，短期内全球经济增长向危机之前的快速恢复极为艰难。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50%，美国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显著攀升的背景下采用传统霸权思维，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改变了对华经贸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美国实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举措逐步升级，其对中国经济在多个方面的脱钩断链、围堵打压渐趋增强，在关键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卡脖子”“抽梯子”等情形也不断加重，这些因素均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1978—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9.65%增至64.24%，但此后该指标回落至2019年的31.99%，近年来虽有上升但2022年仅增至34.76%。1978—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占其全部进口额的比重从0.19%增至19.30%，此后出现波动，2017—2022年该指标从21.58%降至16.53%。^①这些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已发生了持续复杂的转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表现是全球经济出现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趋势，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逆全球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对新格局下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新变量。

除了国际环境之外，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也在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劳动力资源充裕、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的优势，但这种有利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出现转变。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以2010年为分界点，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出现了从增到减的趋势性变化，2010—2022年该指标从74.53%降至68.21%。以2013年为分界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也出现了从增到减的趋势性变化，2013—2022年该数值从10.10亿降至9.63亿。^②与此相对，65岁及以上人口的绝对数、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则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且老龄化程度加剧，这种人口结构一旦形成，其在短期中很难转变，且其对经济社会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就生产力发展而言，此种人口结

① 根据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简称CEIC）数据库所提供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en>，2023年9月28日。

② 根据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数据库所提供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en>，2023年9月28日。

构会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增长动力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新趋势，即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相互交织的新变革时代。根据 CEIC 数据库的资料，2002—2022 年我国互联网网民数从 0.59 亿增至 10.67 亿，互联网普及率从 4.6% 增至 75.6%，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拥有 10 亿级网民数的超大规模信息化国家。考虑到信息化是新技术发展的重要体现，而新技术发展会对经济活动、利益格局甚至国家竞争力产生重塑作用，在面临新技术发展的当代场景，中国如何趋利避害，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无疑是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解答的社会课题。例如，在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后，必然涉及对数据这种要素确权、定价和交易等一系列的规则制定，^① 这种生产关系层面的调整与其他要素相比必然存在差异，生产关系的调整出现之后，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或会受到抑制，其潜在的风险也可能显性化。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广泛深刻的变化，如何回应这种变动趋势并探索生产力发展的新源泉，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这种实践需要同样构成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提出的重要推动因素。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探究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立足于长期的经济建设实践以及现阶段发展格局变动而形成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学理层面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相对于此前的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性？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放在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进行阐释。18 世纪中后期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经济学说演变逐步进入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富增长视角出发对生产力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强调生产力并试图探寻生产力的形成因素。例如，亚当·斯密明确提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②

在亚当·斯密之后，不同的经济学派从多个视角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论述，这集

① 黄奇帆、朱岩、邵平：《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 年，第 141 页；熊巧琴、汤珂：《数据要素的界权、交易和定价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1 年第 2 期；欧阳日辉、杜青青：《数据要素定价机制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2 期。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5 页。

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生产力是人们利用生产要素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表现的能力,它体现着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着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运动中具有能动性的力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则反过来促进或抑制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规律是经济社会变迁的根本逻辑,它构成了不同社会形态演变或同一社会形态中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学说。马克思明确强调,“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和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这即体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主动性、关键性作用。二是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提出了区别于“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说,其中心思想是强调特定国家应依据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来选择经济政策。在李斯特看来,“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② 其原因是“财富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③ 对于处在落后或从属地位的国家而言,为了保护和加速发展本国的生产力,采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保护关税政策是必要的。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以“国家”作为经济考察单元,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和国家保护对后发国家的关键作用。三是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致力于探究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其基本思路是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两个部分:要素供给以及要素组合效率,并以此来阐释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结果的相对贡献度。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在内生技术变化的思路下阐述了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显然,经济增长理论从定量视角对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进行了探究,并构成了对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必要补充。四是经济结构变迁理论,在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中,产业结构变迁总会发生,这促使经济学者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即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的基本趋势,并阐释了这种结构性变动与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思路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库兹涅茨强调必须从产业间的结构特征切入,才能够准确揭示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如果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13 页。

②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22 页。

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18 页。

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中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①进一步地,产业结构变迁则导源于需求端的居民消费结构转变以及供给端的要素生产率变化。总之,已有经济学说从多个视角阐释了生产力问题,这些为在理论层面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资源。在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最重要、最基础的理论依据,原因是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生产力的形成要素,而且强调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这为生产力的时空演变和动态化阐释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强调了国家在生产力保护和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增长理论将要素组合效率引入到分析之中,经济结构变迁理论则关注增长中的产业形态问题,这些学说可以部分地整合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中,从而形成对“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内涵的系统化阐释,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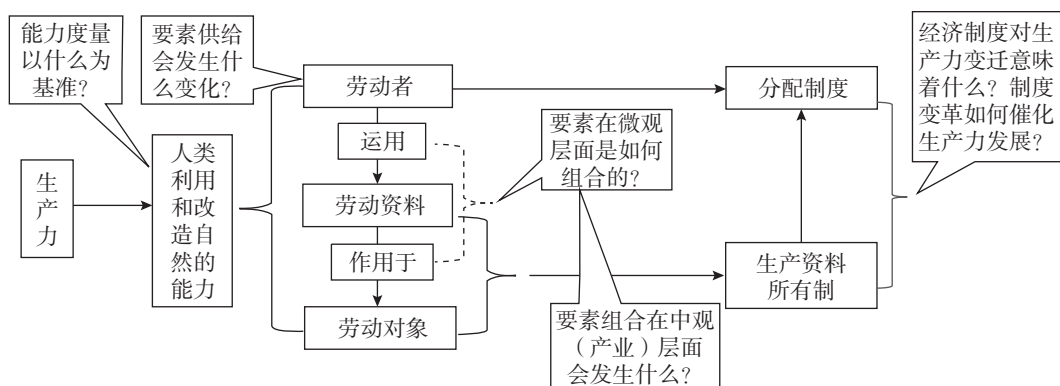


图1 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的一个逻辑框架

在图1中,“生产力”这个概念被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进行认识。生产力是指人们利用各种要素进行产品生产的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体现在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这样的过程中。要素在组合过程中结成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的具体化即为经济制度,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经济制度通过影响各种主体的行为选择而对下一期的生产力产生作用,由此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作用就具有动态演变特征。立足于这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生产力”的学理探究可从如下方面进行拓展。一是生产力反映了人们利用各种要素进行产品生产的能力,这里必然涉及能力的评价者和评价依据问题,即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里的“能力”高低。任何社会生产最终解决的都是人的

^①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4页。

需求问题，因此生产能力的评价者是特定经济体的社会成员，评价基准是产品对成员需求的满足程度。基于此，在社会成员需求发生趋势性转换的情况下，生产力中的“能力”具体指向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二是生产力建立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三类要素供给的基础上，这些要素具体表现为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要素的种类、范围、规模、内涵等也在发生变化，此前未能作为生产要素的部分——例如海洋、太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成为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将必须在开放的、历史的思维下理解生产要素。三是生产力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而表现出来的能力，这里不仅涉及生产过程利用了哪些要素，而且涉及生产中这些要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即使是同样数量和质量的要素，其要素组合方式的差异也会导致生产结果迥然不同，就此而言，在生产力研究中分析要素组合效率就不可或缺，探究要素组合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问题至关重要，新增长理论对技术形成机制的关注值得借鉴。四是与生产力关联的要素组合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企业效率，在中观层面体现为产业形态，即作为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集合，产业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呈现怎样的结构特征，在不同时期产业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动的，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分析应引入产业结构变迁因素，后者成为连接企业微观行为和宏观国民经济的“桥梁”。五是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需要驱动力量，这种驱动力量的形成逻辑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调整完善改变了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经济制度的形成或变迁中，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① 国家是经济制度的“主要供给者”以及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国家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来引导微观主体行为，这是特定国家生产力动态变化的动力源泉，这在李斯特所描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中尤为重要。总之，图 1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基础，通过引入其他学说的部分观点，形成了一个探究生产力问题的比较系统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为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依据。按照该框架，“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从如下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在结果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是指在传统生产力之外，出现了与城乡居民需求变动相匹配的产品生产能力，这种能力是为满足人们的新型需求而诱发的，其与满足人们此前的需求及其能力存在着差异。如前所述，生产力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根本导向，但人的需求具有变动性和差异性，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与需求变动引致的产品供给能力紧密相关。在经济研究中，恩格尔系数表达了人们的需求结构变化趋势，按照 CEIC

①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21 页。

数据库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1978—2022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57.5%降至29.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67.7%降至33.0%。当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在30%左右,^①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产型资料主导转变为发展型、享受型资料主导。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和消费结构的转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需求端”表述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乡居民对物质产品之外的产品例如信息化产品、绿色生态产品等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些新需求的满足正成为生产力中“能力”的重要判断依据。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例如除了改造、利用生产力之外,保护生产力也成为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②这种情形意味着生产力增长不仅包括已有生产在规模上产生的增量,而且包括因人们需求结构、层次转变而诱发的新产品供给状况。

二是在要素意义上,生产力的形成依赖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生产要素通常是指劳动、土地、资本等有形要素,新质生产力是指在已有要素之外出现了新类型要素,要素的范围和种类得以扩展,且要素供给的侧重点从数量逐步转向质量。从历史角度看,在农耕社会,形成生产力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在工业社会,形成生产力的主要要素扩展为土地、劳动、资本等,但在信息社会,生产要素在此前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等要素,要素的范围再次扩大,要素的类型更加多元。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数据被纳入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素范围,这是我国在深刻把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要素范围进行与时俱进拓展的重要体现。已有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双维驱动”作用,即数据要素既能通过自身的经济增长效应直接驱动经济增长,也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间接驱动经济增长。^③除了范围和种类方面发生变化之外,生产要素的强调重心也呈现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的明显转变。例如,劳动力要素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含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1978—2021年中国男性高校入学率从0.98%提高至58.81%,女性高校入学率从0.42%提高至68.99%,这反映出我国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水平在快速提高。与此相关联,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而非劳动力数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按照布卢姆

① 数据来源: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https://www.ceicdata.com/en>。

② 洪银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③ 杨艳、王理、李雨佳、廖祖君:《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要素的“双维驱动”》,《统计研究》2023年第4期。

(Bloom)等的研究,^①特定国家的人均GDP可分解为三个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生产率。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1990—2022年我国人均GDP从1 650.7元增至85 723.9元,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66.7%增至2010年的74.5%,之后降至2022年的68.2%,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84.9%降至2013年的75.5%,之后缓慢攀高至2022年的76.2%,而劳动生产率则从1990年的2 914.8元持续增至2022年的164 988.5元。^②这说明,我国人均GDP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非衡量劳动力供给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以及劳动参与率。

三是在要素组合意义上,生产力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紧密相关。新质生产力是指在给定要素供给的基础上,依靠要素组织、技术等变革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并以此形成产品或服务的产出增量。从逻辑上说,影响要素组合效率的主要有两种因素:一是组织,即要素借助什么样的载体而结合;二是技术,即要素借助什么样的工具而链接。前者方面,微观层面的组织创新可以导致生产要素再配置,形成对经济主体的利益格局调整,从而在激发市场活力的条件下驱动生产力发展。1978年我国农村开始出现了“大包干”对人民公社制的替代,这种新型农村生产组织方式随后发展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本质是农村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了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向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转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村劳动、土地、资本之间的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农民拥有了劳动力和承包土地的经营决策权,并具有了在承包地上投资之后的剩余索取权,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农村要素供给给定前提下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后者方面,技术既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也是对其他要素的组合具有催化作用的复合要素,技术进步会导致劳动、土地、资本等重新组合并产生“1+1>2”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现阶段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产业科技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对要素组合方式也在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建立在数据技术应用基础上的工业互联网导致企业生产流程发生改变,生产的智能化、供应链的柔性化以及研发的协同性不断增强,平台经济成为改变企业生产以及供求对接方式的新型业态。江小涓、靳景将数字技术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机制概括为三个方面:提高服务业分工与协作效率,

① D. E. Bloom, Canning, D., Linlin, H., Yuanli, L., Mahal, A., W. Yip, “The Contribution of Population Health and Demographic Change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8 (2010), pp. 17–33.

② 数据来源: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https://www.ceicdata.com/en>。

提升全域全链业务贯通和协同能力,创造新的数实孪生叠加效应。^①由此可见,组织和技术创新在要素组合效率变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两者均对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产生了整合作用,同时导致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呈现出同步进行和交互影响等趋势。

四是在产业形态意义上,产业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集合,企业在要素组合和产品供给方面的变化,必然会引致产业形态发生相应转变。就此而言,新质生产力是企业因采用新要素组合方式提供新产品以更好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从而在“企业集合”意义上形成新业态和新结构。从时序角度看,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迈向工业社会,进而再迈向信息社会,这种转变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不断出现新产业,产业间的关系即产业结构也呈现出趋势性变化,原有产业的占比相对下降,而新兴产业的份额在相对攀高。新质生产力是对上述趋势的延续,即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出现了新产业类型,且产业间的比例关系等在持续发生转变。1978年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种类和形态的多样化,产业体系的完整程度得以显著增强,当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现阶段科技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特征明显,这种情形为我国产业形态的持续转变提供了实践需要,也提供了客观条件。我国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产业,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均是对这种情形的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就是从产业变迁视角出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除了形成新产业之外,产业形态转变还体现在产业结构的趋势性转变上,事实上,新产业的形成、崛起和发展总会引致产业结构转变。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1978—2022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7.69%降至7.30%,第二产业占比经历了先下降后增长再下降的变动轨迹,2006—2022年该数值从47.56%降至39.92%,第三产业占比则从24.60%逐步攀高至52.78%,2012年之后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我国GDP占比最大的产业。^②这表明我国在产值占比意义上开始走向工业化中后期或服务化阶段,也表明我国在产业结构意义上形成了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的积极回应。

五是在保障意义上,生产力发展以相应的生产关系作为保障因素或驱动力量,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要求与生产结果、过程变动相契合的生产关系因素,缺少经济制度的

^① 江小涓、靳景:《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服务分工、产业协同和数实孪生》,《管理世界》2022年第12期。

^② 数据来源: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https://www.ceicdata.com/en>。

支撑和配合,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耦合的“新质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在结果意义上与居民的需求变动相关,在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等方面则与系统化的变革相关,因此在生产关系维度,它内在需要“制度组合”与之相适应,这些制度既要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又要激发经济创新的活力。特别是,新的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内在要求对经济主体有新激励、新治理,这对政府—市场两者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新课题。例如,科学技术创新是影响要素组合方式的关键因素,但科学技术创新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是一个从基础研发到产品应用的系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这两者之间的组合关系至关重要。在0—1的原始创新环节,由于创新的探索特征极为显著,研发投入风险高,成果溢出效应强,则政府的组织策动和资源投入就举足轻重,市场力量处在相对次要位置;在1—10的转化创新环节,创新已有部分基础条件,且创新带来的成果溢出效应变小,这就需要政府产业政策引导和企业风险投资引入两者的配合;在10—100亿的应用或扩展创新环节,创新的前段条件较为成熟,产品开发带来的市场收益预期较为明晰,在这一阶段企业的作用就应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作用主要表现为维护健康稳定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环境。由此可见,政府和市场力量在创新中都不可或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对科技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新质生产力形成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更需要依靠政府和市场的组合形成持续发展动能。我国的经济制度组合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味着我国在政府—市场关系方面具有独特性: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区别于政府—市场两者的“替代”思维,我国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视角中来理解政府—市场关系的,经济制度的独特性使得我国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能够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兼顾政府作用和市场力量,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

综上所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产力分析框架,我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具有多个维度的内涵,表现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保障等方面。与此前的生产力概念——一般生产力——概念相比,新质生产力也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为出发点,也需要多种要素的参与,也需要与生产关系之间形成互动,在这些方面,一般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是相同的。但区别于一般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结果意义上主要满足人们发展型、享受型的需要,其使用的要素范围扩展到数据等

方面，且更加强调要素的质量维度，其推动要素组合的组织、技术复杂程度更高，且出现了新的产业形态，产业融合和结构变迁进程加剧；在保障意义上，新质生产力高度依赖政府—市场关系的组合或相互交织，强调经济制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兼顾。如果说一般生产力契合于农耕社会或工业化时期，那么新质生产力则更加契合于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时期。表 1 展示了一般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两者的关系，这种比较分析也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表现是多方面、立体化的。

表 1 “新质生产力”和“一般生产力”的内涵比较

项目	结果	要素	要素组合	产业形态	保障	所处阶段
一般生产力	主要满足人们的基础型需要	土地、劳动、资本；强调要素数量	推动要素组合的组织、技术复杂程度低	农业、工业、服务业	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界清晰，强调稳定性	农耕社会和工业化时期
新质生产力	主要满足人们的发展型、享受型需要	要素范围扩展到数据等；强调要素质量	推动要素组合的组织、技术复杂程度高	出现新产业，产业融合和结构变迁加剧	政府与市场交织，强调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兼顾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时期
两者的共同点	都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为出发点，都需要多种要素的参与，都需要与生产关系之间形成互动					

三、“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时代意义

“新质生产力”在我国的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它是我国基于现阶段经济发展实践和战略部署提出的新概念，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具体应用，是我国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与一般生产力相比存在着独特性。基于这种认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以及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层面，新征程上我国需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由两个“十五年”战略目标内在规定性的，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使此前生产力的规模增大，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体现出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回应。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出发，现阶段我国推进经济建设时需要重视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城乡居民需求变动来调整生产力指向。当前我国人均 GDP 正迈向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也处在 30% 左右，由此出发，我国在注重满足城乡居民物质产品需求之外，必须更加注重满足居民物质产

品之外的其他需求,对居民新增需求(例如信息产品需求、绿色生态需求、健康养老需求等)予以敏锐研判和及时供给,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来看待生产力概念。从宏观视角看,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例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辅相成。二是围绕要素组合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努力。新质生产力与要素组合方式及效率紧密关联,已有研究也显示,经济增长在根本上是一个生产率提高而非要素供给增长的过程。^①新征程上我国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依靠组织和技术创新,不断推动要素组合方式变革,进而在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促使产出成果增大、产出结构优化。在这方面,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仍存在差距,根据佩恩表(PWT10.0),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为1,则2010—2019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致处在0.40—0.44这样的区间,低于德国(0.90—0.94)、法国(0.90—0.95)、英国(0.76—0.83)、日本(0.63—0.68)、韩国(0.59—0.68)等。^②按照CEIC数据库的资料,2010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仍存在明显差异,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仍有显著差距。2022年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值是4.58,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值是3.69,^③这从侧面反映出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仍存在错配状况,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仍有较大空间。反过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加速转型以及科技创新的增强关联着要素组合效率,因此应成为新征程上我国大力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努力方向。三是依靠生产关系调整完善来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等方面的变化都受到经济制度的影响,因此大力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推进经济制度完善,在制度创新中形成发展活力。新征程上我国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不同类型所有制经济提供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这样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我国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从基本经济制度的独特性出发,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政府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的资源动员优势,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基本公共产品,依靠分配制度完善来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和地理超大规模国家而言,我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还应关注政府间的结构特征,进一步推

① 刘培林、刘泰然:《生产率重于生育率》,《比较》2023年第2辑。

② 资料来源: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根据Penn World Table 10.0计算整理所得

③ 资料来源: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数据根据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en>)计算整理所得。

动政府间经济发展力量的协同，特别是依靠行政考核和激励机制完善来调节纵向的央地关系，促使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实施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学领域的新范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课题。这一范畴和课题的提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经济理论创新也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对实践经验和趋向的抽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促使人们思考与此相关联的经济理论。例如新质生产力的测度问题，人们通常用 GDP 或人均 GDP 来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新质生产力关联着居民新需求的满足和新产业的出现，在引入这些新元素的基础上准确测度生产力就成为新课题，当前在实践中有地区先后开展了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试点，^① 这可视作对新质生产力测度的一种尝试。新质生产力与此前生产力（一般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新质生产力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以一般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了一般生产力，由此准确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联系与区别以及替代或促进作用就具有必要性。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问题。在现有研究中，人们通常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分开来进行考察，但新质生产力关联着要素组合方式变革，其促使四个环节的同步性、交叉性显著增强，这为重新理解经济不同环节的关系提出了客观需要。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就业和分配效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意味着要素供给、要素组合以及产业形态发生变动，这种变动对微观主体而言意味着利益格局调整，其必然会对就业和分配格局产生影响，这意味着需要研究新质生产力对就业产生的是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缩减功能还是扩大功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同样存在，由此出发，人们需要探究新质生产力如何导致了生产关系变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契合的生产关系应有哪些具体特征，微观主体之间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会发生哪些变化等等。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产业变迁规律问题。新质生产力伴随着产业出现新形态，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特征增强，与这种产业变迁相关联，人们需要思考此前的三次产业变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工业化和服务业化的依次变动是否会出现逆转，工农和城乡经济关系演变会出现哪些新趋势，等等。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政府—市场关系问题。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政府作用紧密相关，与一般生产力发展相比，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政府的作用领域、方式需要做出调整，据此就需要探究新质生产力需要政府—市场形成怎样的组合，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重新思考政府—市场关系提供了哪些启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哪些独特性，等等。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这

① 石敏俊、陈岭楠：《GEP 核算：理论内涵与现实挑战》，《中国环境管理》2022 年第 2 期。

个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它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系列值得探究的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对于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提供了必要资源，而且提供了重要契机。

The Logic,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 and Current Significa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ao Fan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new economic concept put forward by China based on the zeitgeis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logic,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cept, emphasizing that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China stems from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rom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a’s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t bring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contradictory and motive laws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dimensions of results, factors, factor combinations, industrial forms and guarantees, and then compare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 that of productivity in general. Based o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cept at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s, pointing out that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or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thor: Gao Fan,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